

“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”行动被指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公安部: 被拍者基本没有被拐儿童

昨日,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官方微博首次就自去年在微博上兴起的“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”行动发声。该局官方微博表示,自这一网民自发行动开展以来,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,建议“发起人一定要谨慎从事,不能让爱心廉价支付,更不能让无辜者心灵受伤。社会需要爱心,同样也需要尊重。”



■“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”行动自开展以来就伴随诸多质疑 (资料照片)

去年春节期间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倡议并发起的“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”行动,受到众多网友支持,并在微博上形成热潮。各地网友纷纷将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,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踪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。

遭众人质疑
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的警方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,并在本地媒体的联动下,对流浪乞讨儿童进行排查。

不过,自行动开展以来,社会上的争议之声从未停止。因效果乏善可陈,“随手拍”被疑终将成为一场“闹剧”。

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闾丘露薇曾就此提出过自己的几点疑虑:1.未经监护人同意,传播未成年人照片不妥,在有些国家地区会触犯法律。2.未经法定定罪,连犯罪嫌疑人都有隐私权。3.社会到底是要“宁可错杀一千”还是“宁可损害一个无

辜”?4.报警,警方不作为,投诉。5.儿童乞讨,不止拐带,亲人是否应承担法律后果?

众多律师也曾就此提出担心,认为网友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,但随手拍照将公民照片上传至网络,质疑其为“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”的做法,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,并不值得提倡。

发起人回应

活动发起人于建嵘曾就此回应称,很多人目前还存在一个误区,“我们的行动不是‘打拐’,因为有的流浪乞讨儿童并不是被拐卖的,我们的目的是让那些儿童离开乞讨,得到社会的救助。”

不过,他的这一回应并未能平息争论。

今年8月20日,有网友发布微博称,在北京731路公交车上看见一位小女孩边哭边喊“找妈妈”,她和同行的中年妇女口音不同,妇女“不敢正视他人”。该网友称,妇女假装打电话说,“是妈妈吗?我们很快

就到了,她哭了,来跟妈妈说话”。但她刚把手机凑到女童耳边就收了回来。因怀疑女童遭遇拐卖,这名网友将女童的照片发到网上并报警,引发网友数万条转发。

后经警方核实,女童并非被拐儿童,与其同行的妇女为其姑姑,当日是该妇女将女童从中关村接回住地。

勿伤无辜者

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昨日发布的微博引用了该网友上传的图片,并就此对“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”行动提出建议。微博称,“随手拍”行动中,“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。网上如潮般的公益热心感人肺腑,但发起人一定要谨慎从事,不能让爱心廉价支付,更不能让无辜者心灵受伤。社会需要爱心,同样也需要尊重。”

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转发了该微博,并评论:“赞成。发现疑似被拐儿童可当场询问或报警核查。”

据山东商报

卡没丢巨款“飞”了—— 谁该为“克隆卡”盗刷埋单?

卡未离身,596万元巨款不翼而飞。广州商人朱女士做梦都没想到,近两年来不断见诸报端的噩梦,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。

来自广东省银监、公安部门的信息显

示,2011年以来,克隆银行卡盗取存款已成为一大经济犯罪类型,已形成从生产销售侧录设备、窃取信息、制作伪卡到套现的黑色产业链。值得关注的是,当前盗刷普遍遭遇举证难,谁该为“克隆卡”盗刷埋单?

“穿越时空”:银行卡频频被盗刷

“当时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‘魂飞魄散’。”受害人朱女士说。

7月中旬,朱女士到银行ATM机取现,连续两次操作均未成功。朱女士以为是ATM机出现故障,当时手机正好没电。等回到家充完电开机后,接连收到来自发卡银行的7条短信,显示其名下2张银行借记卡从POS机刷卡消费了596万元。这是近年来广州地区被盗刷数额最大的克隆银行卡案件。

广东省银监局、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朱女士报案后,银联立即冻结相关账户,迅速锁定克隆卡盗刷地点——广州市个体工商户胡某在“总统数码港”的商铺安装的POS机。警方后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,缴回涉案银行卡15张,损失资金全部堵截。

在特约商户的POS机上,特别是高档餐饮、酒店、娱乐场所以及房地产售楼部等大额交易场所,也会

防交易风险:IC卡为何推广难?

广东省银监局的调查显示,磁条卡技术门槛低,而芯片IC卡目前没有任何复制手段。欧美、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都已陆续完成IC卡改造。

根据银监会和中国银联等文件,我国将在2015年以前普及芯片卡。但是,调查发现,尽管一些银行称正在积极推广IC卡,但在银行营

业厅,很少见到实质性行动。

“由于生意往来账款数额比较大,我特别跟银行客户经理提到克隆卡问题,对方只是强调说白金卡是最高级别VIP,‘有先进的侦测系统’,但就是不推广使用IC卡。”广州市民刘女士说。

中国银联有关人士说,目前全国发行的银行卡约有31亿张,一张

盗刷举证难:密码泄露谁之责?

广州的邱女士前不久因信用卡被盗刷,向公安机关报案。为证明后两笔消费非本人操作,邱女士向审理案件的法院出具了港澳通行证。多方证据显示,在澳门消费的是一名香港居民。法院经审理判决,银行与邱女士各承担50%的损失。理由是银行接受了非法复制的银行卡交易,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;而邱女士没有保管好密码,没有证据证明密码是由于银行原因泄露的。

与朱女士巨款被追回、邱女士担责50%的案件相比,湖北省蕲春

县农民陈中平的遭遇更为离奇。3年前他的农行卡中近13万元被盗刷。与农行对簿公堂后,案子竟然一波三折。2010年9月,蕲春县法院判他胜诉;农行上诉后,案子发回重审;去年底,蕲春县法院又判陈中平败诉,理由是“对于第三人违法安装摄像头、读卡器造成信息被窃取,没法举证”。依然在等待二审结果的陈中平满脸委屈。

资料显示,克隆卡盗刷案的争议焦点多数集中在密码泄露的责任上。由于持卡人很难证明密码泄露不

出现“内鬼”作案。甚至有不法分子专门培训,根据持卡人在密码器键盘操作的姿势动作,推测还原密码。

“从把信息输入电脑,到重新写入一张磁条卡,只需几十秒钟。”办案人员说,而读卡器等设备在网上或电子市场都可轻易买到。

在广州最大的克隆卡盗刷案件中,特约商户胡某向警方交代,他帮人刷卡套现获取了3%的好处费。一些犯罪分子还复制多张卡,在不同地方同时操作,有些是选择半夜操作,使持卡人来不及报案、冻结。

IC卡制作成本30元左右。即使一半是“休眠卡”持卡人自动放弃,也涉及费用五六百亿元。“国家规定,换卡不能收工本费,这笔费用由银行承担。这笔钱分摊到几十家银行,应当成本减少很多。”

一位国有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,在更换IC卡问题上,因为前期的改造成本高、技术难度相对较大,所以银行普遍存在“搭便车”的想法,指望别人先做。

是自己的责任,在法院判决中经常得不到支持,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。

“当前的司法判决中存在天平倾向于银行的现象,”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民安说,“当前克隆卡犯罪情况猖獗。根据侵权法,银行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。”

从目前破获的案件看,密码的泄露多源于不法分子偷窥,因而持卡人自我防护是关键。当然,银行、持卡人、特约商户、收单机构等都对对银行卡的使用履行义务,这样才能真正保障银行卡的安全使用。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王凯蕾 毛一竹 (据新华社广州8月28日电)

据悉,南京、兰州、郑州、济南四城市正在进行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试点。在这些地方,“劳动教养”制度正在被“违法行为教育矫治”所取代。专家认为,上述试点将为全国范围内的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积累经验。

兰州济南 南京郑州为试点城市

中国之声《新闻纵横》27日报道,在甘肃、山东、江苏、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。新京报记者多方求证获悉,这四个城市分别为兰州、济南、南京、郑州。

2011年,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印发《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,上述城市被列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试点地区。这意味着,在上述地区劳动教养这一概念被全新的“违法行为教育矫治”所取代。从有关单位的宣传材料看,试点开始后,工作重点将放在“教育”和“回归社会”上。

违法行为矫治法 两纳立法计划

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于1957年确立,“文革”期间停止实施。

上世纪80年代,随着这一制度的恢复和“严打”的开展,劳动教养制度适用的范围也被扩大,规定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、尚不够刑事处罚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,一律送劳动教养。

劳动教养制度被认为与宪法、立法法、行政强制法等的精神相违背,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过长,劳教决定作出的程序缺乏透明度,比较随意。

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,都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议案、提案,要

行为教育矫治」所取代——
「劳动教养」这一概念正在被全新的「违法

四城市试点劳教制度改革

求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,用“违法行为教育矫治”来取代劳动教养制度。

在2005年和2010年,制定违法行为(教育)矫治法两次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。但是,这部法律至今仍未出台。

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告诉记者,“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”将缩小适用范围,采取比较合理的程序,相关部门也基本达成共识。但是在强制措施作出机关设在哪个部门问题上,各方意见不一,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也因此停滞。

试点办公室 仍设在公安局

2011年11月8日,被列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试点地区的南京市政府下发通知,决定成立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。小组组长由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担任,成员包括法院、检察院、政府法制办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、共青团、妇联等机构负责人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地点设在市公安局,由公安局副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。

甘肃省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有关人士表示,此次改革重点在于劳动教养审批环节,委员会仍设在公安机关。

陈忠林分析说,此次试点虽然数量不多,但是涵盖了南方北方、东部西部,在样本选取上有代表性,将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。

陈忠林表示,立法的难点在于“审批机关设在哪”,公安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必须作出改变。
据新京报